

第二章

初抵河内

由渝飞昆 初获越情

四川号称“天府之国”，但交通不便，素有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之说。国民党统治时期，重庆作为“陪都”，其庞大军政官僚机构的人员来往和物资运输非常频繁，交通经常堵塞，行旅甚为不便。日本投降之后，为了抢夺胜利果实，接收（实际上是“劫收”）大员纷纷出动，致使交通更为艰难。当时重庆只有通往昆明的航线，没有飞至河内的民航飞机，而且每周只开两三班，机票十分紧张。1945年9月15日，赴越接受日军投降的卢汉司令已率部进入越南，要我们顾问团尽早赶赴河内配合工作；尽管我们依仗有国民党行政院的特权，但也只能购到9月19日的机票。19日上午八时，我和财政部代表朱偁、经济部代表庄智焕在重庆珊瑚坝机场汇合，同机飞往昆明。

到昆明后，我下榻于报国街28号友人张忠保寓。由他陪同会晤了阔别多年的友人陈修和。陈原系黄埔军校七期出身，与何应钦有师生关系，颇受何的器重。曾任蒋介石的侍从

武官，后调国民党兵工署任兵工研究专门委员。抗日战争期间赴越南代表军工署筹办军火运输事宜，后兼任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处长。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何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时，他任陆军总司令部驻昆明办事处主任，后兼任越南占领军司令部第五处副处长。他对越南问题很有研究，著有《越南古代史及民族文化之研究》一书，对越南革命很表同情，会晤时曾赠我一本。他刚从河内回昆明，对越南情况了解甚详。听他谈了对越南的观感，使我茅塞顿开。他说，整个越南正卷入“八月革命”的风暴中，政治上的情况与事先所想象的迥然不同。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国，成立了临时政府，临时政府“坚决反法，不准悬挂法国国旗，受到了越南人民的拥护，如果我们不同他们合作，或让法国军队回去，就会遭到越南人民的反对，发生中越冲突，影响受降。”①他为人直爽，说话开门见山。因为与我较熟，见到我就立刻指出国民党外交部对越南种种不妥的措施。我既是国民党外交部的代表，当然成为他责难的靶子。这是不足为怪的。

初抵河内 景象异常

由于昆明与河内不通民航。我们乘坐昆明空军特意从上海调来的一架中国民航飞机，于9月21日上午10时起飞，11时30分到达河内嘉陵机场。

下机后，但见一片荒凉，不禁使我浮想联翩，思绪万千。法国殖民者的长期掠夺，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蹂躏，竟使越南大好河山变成了废墟，满目疮痍，一片萧条。据说当时越南北部和中部山区发生了非常可怕的饥荒，二百万穷苦人民因饥饿

而死亡。②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，怎能不激起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愤怒反抗！

在机场等候良久，才见到日本人驾驶的卡车来接。我们乘着大卡车，摇摇晃晃越过杜美大桥（Pont Doumer），进入城内。沿途看见若干彩色牌坊，悬挂中、英、美、苏四国国旗和黄星红底的越南新国旗，独不见法国的三色旗。到处贴着用越、中、英等国文字写的“越南独立万岁”等标语，独不见法文标语。从这里可以隐约感觉到“八月革命”的气氛。可见陈修和言之有据，并非耸人听闻。

初会卢汉 话不投机

我们一行到达河内后，为了解决食宿问题，忙碌了整整两天。至9月22日上午，卢汉司令才派他的副官来到我们的住所，接我们去见他。他住在越南总督府里，就在日本侵越时向日军投降的前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、海军中将德古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们。这座总督府，是用越南的民脂民膏建立起来的一座三层法式大厦，古朴、宏伟而又豪华。中作塔形，分左右两翼，前为大理石台阶，大厦前广场立旗杆，高悬国民党国旗。办公室内的摆设布置颇为富丽堂皇。而卢汉司令也俨若当时当地的最高统治者，坐在宽大办公桌后的安乐椅上，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有关号令。

卢汉（字永衡），云南昭通燕山的彝族人。年十六时就跟随龙云外出投军，后同龙云一起被保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堂。长期追随龙云南征北战，击败反对势力，统一云南，帮助龙云当上了云南省府主席，卢即为龙统帅云南军队。1945年初，蒋

介石把在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，任命卢汉为总司令。日本投降后，蒋介石为了解除云南后顾之忧，处心积虑地将卢汉派赴越南，接受日本投降。他既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，又是一个深谙世故的政客。他那精悍老练、沉着冷静的军人风度，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当想到他的个人野心将被蒋介石利用的时候，我又为他暗中担心。这时他还被蒋介石蒙在鼓里，正踌躇满志，趾高气扬，以胜利者的姿态，指挥受降。

在我未去越南以前，何应钦主持的陆军总部早已制订几条受降办法。大意是：一、接受日军投降，解除武装，遣送回日；二、组织军政府管理民政；三、驻云南的法军在原地待命，不准入越，如有个人自愿回越者，必须解除武装。^③这个决定既未把法国人当作交涉对象，也未考虑把越南交还法国，更谈不到同他们合作。卢看到国民党行政院炮制的《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》与他的受降办法迥然不同，卢大为不满，认为这十四项原则完全不切实际，因此气势汹汹地用质问的口气对我说：“1943年开罗会议^④时，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蒋委员长表示，战后决不能把印度支那归还法国，而应置于国际托管之下。蒋委员长对此没有表示异议。为什么现在‘变卦’呢？”他认为事关重大，要我立即回重庆向蒋介石请示。

我当即对他说：“兹事体大，我一个人单独去请示，恐力不胜任”。其实，我不是谦逊，而是暗中有难以告人的隐衷。1945年初，我在兰州外交特派员任内，曾受蒋介石亲批“斥责”。我深知这个独裁者的脾气，你若一旦受到他的斥责，则以后必会再受他的斥责。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卢汉当即同意由顾问团再派一人同我前往。

经顾问团全体代表协商结果，加推邵百昌与我同行。这一下我就放心了。邵百昌为陆军中将，过去我不认识，这次我才知道他是陈诚系军人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学习炮兵，辛亥革命时，曾参加武昌起义，原任军政部驻昆明办事处主任。和他同返重庆会见蒋介石，我就不会首当其冲了。

返渝请示 山洞电话

1945年9月25日，邵百昌和我同机赴昆明，然后转机飞重庆。27日往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（字启宇）。由于我在1940年以后曾任国民党外交部简任秘书兼交际科长，主持礼宾工作，所以早就认识他。

邵百昌和我见了商震，立刻说明来意。商震毫不迟疑地对我们说：“很不巧，总裁已经离城到山洞，正在那里准备飞西昌。我立刻打电话向他请示吧。”

于是，他摇了一下军用专线电话，向蒋介石报告说：“河内卢汉司令派邵百昌、凌其翰来重庆向总裁请示应付越南的方针。”这时我站在电话机旁，就能听到蒋介石的声音。他说：“他们两人不必来山洞了，要他们立刻回河内转告卢司令三点指示：一、牢牢掌握老街——河内——海防运输线；二、对越南当局应采取不管态度；三、让法军开入越南，不得予以阻挡。”

从商震的电话机旁，听到蒋介石的宁波国语是如此清楚，以致商震放下电话，再向我们传达时，似乎是有些多余了。

我当时觉得蒋介石的语气是很坚决的，在下达这三点指示时，不加思索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，丝毫不含糊，好象成竹在

胸。足证他的主意决不是仓卒定下来的。

上述蒋介石的三点指示,其重点是第一点,即牢牢掌握老街——河内——海防这条运输线。其真正目的是借口进军越北接受日军投降,以便调出西南可调的军队,假道越南,从海路运往东北,其最终目的在于抢夺东北抗日胜利果实。

三点指示的第二点,对越南当局应采取不管态度,不久就有了补充。卢汉司令曾接到蒋介石来电又指示五点:一、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;二、越军进入我防区即须解除武装;三、对越党不干涉;四、亦不警戒;五、对法人生命财产尽力保护。

我回到河内,得知此电后,于1945年10月20日,即将这五点指示电告重庆外交部。

① 见陈修和著: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人越受降纪略》。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七集,第18页。

② 见《胡志明选集》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二卷第2页。

③ 见上述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七集,第16—17页。

④ 开罗会议是1943年11月,中、英、美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。这次会议于同年12月1日发表了中、英、美三国开罗宣言。这个宣言曾对将台湾等地归还中国作了明确的规定。在会议期间,罗斯福和蒋介石曾谈到战后不把越南归还法国问题,并达成了口头谅解。